

# 第一章 城市的演进与城市建设档案

## 第一节 城市的起源与发展

### 一、从原始聚落到城堡聚落

城市是人类原始聚落经过数千年演进的结果，是社会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公元前 6000 年前后，我国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由于农业已从渔猎狩猎中分离出来，使人类的定居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最原始的聚落。到了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大约在公元前 2500 年，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剩余产品增多，手工业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一小部分部落首领集中了较多的财富，成为贵族阶层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使得部落内部和部落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激化，部落间的兼并与战争促使强势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产生，从而促成作为防御工事的城堡的出现和贵族阶层拥有统治权力的国家机器的诞生，使我国社会的发展进入由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

1979~1980 年在河南淮阳县发掘的平粮台遗址，就是一处龙山文化晚期具有代表性的城堡式聚落。遗址总面积约 5 万平方米，城内居住面积约 3.4 万平方米。遗址已发现的建筑有现存城墙长、宽各 185 米，平面呈正方形，高 3 米多，下部宽约 13 米，顶部宽 8~10 米，采用比较先进的小版筑技术。两座城门坐落在南、北城墙中央，位于城堡中轴线上，南门两侧有门卫房，南北城门有土路相连。城内还有十几座地面和高台建筑基址与多处陶制排水管、陶窑、墓葬等。

平粮台遗址和在我国多处发掘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堡聚落遗址，虽规模较小，功能单一，内部布局也比较简单，但它们却标志着我国早期城市的出现已经为期不远。

### 二、早期城市的形成

公元前 2100 年前后，夏王朝建立，我国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夏代已开始使用青铜工具，农业、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贝币”开始出现，已有“夏鲧作城”之说。到了商代，青铜器的冶炼达到相当水平，已存在较为固定的产品交易市场，“文字”作为一种记载符号已经出现，“城”的建筑已初具规模。继商之后的周代，铁器已经开始使用，农业、手工业得到较快发展，商品交换进一步扩大，文献上已有“前朝后市”的记载。加之建筑技术的进步，西周出

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建设高潮。

自夏至周 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奴隶制社会下“城”的建设一直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到了西周 由于“城”内人口进一步聚集，“城”的经济功能逐步增强，“城”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宫殿建筑已具相当规模，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已经显露。

在我国早期城市的考古发掘中 先后有河南的偃师二里头、尸乡沟 郑州的商城 湖北的黄陂盘龙城 河南安阳的殷墟 陕西的岐周、丰邑、镐京 以及河南的洛邑等遗址。我们可以从安阳殷墟的规划建设情况了解我国早期城市的一般状况。

殷墟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部，横跨洹河南北两岸，是商代后期的一座王都。遗址比较集中的地区面积约 24平方公里，至今未发现城墙。它的中心部分是由东北两面利用洹河的自然弯曲，西南两面则挖掘宽 7~21 米、深 5~10 米大沟所围成的一座别具一格的“宫城”。据规划专家称，这可能是殷城采取开放型规划结构形制的结果。遗址以宫廷区为中心，外围环布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及洹河北岸的王陵区。宫廷区有 53 处建筑遗址 由宫室、宗庙和祭祀场所组成 仅宗庙建筑的范围就达 2 万平方米 包括 21 座建筑组成的建筑群，在基址下压有纵横交错的水沟。宫室的房屋多为矩形和凹形，单体面积最大的为 40 米 × 10 米 房屋结构为卵石柱础支撑的木构架、草屋顶。在王宫范围内还发现多处窖穴、灰坑和一些墓葬，其中一座圆形的窖穴出土 17047 甲骨文片，据考证可能是王宫的档案库。在手工业作坊内发现有青铜器、骨器、陶器等。由此可知 在商代后期 我国早期城市已经形成。

### 三、城市的产生与演进

学术界一般认为，我国于公元前 475 年，即春秋末期进入封建社会。到了战国，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铁制农具的出现、耕作技术的改进，农业有了较快的发展。此时，手工业除保留官办的作坊外，民营与个体手工业也有一定发展，特别是冶铁和制盐业已成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生产逐渐增长 商品交换日趋繁荣 市场不断扩大 过去专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宫市”逐渐发展为规模较大，为各阶层服务的独立商业区。战国以后这种在“城”中兴起的商业区，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堡聚落乃至早期城市作为奴隶主政治城堡的性质，使其演变为封建社会的一方政治经济中心。至此，“城”与“市”的有机结合，一个兼具政治经济双重职能的“城市”也就应运而生。

齐国的都城临淄就是战国后期一座最宏大的中心城市，人口达 30 万。遗址位于今山东省淄博市。城市总体规划是以宫城为中心的分区规划结构形式，由大城（外廓）和小城（内廓）两部分组成。内城位于大城的西南角 面积约 15 平方公里，是城市的政治活动区 内有宗庙、寝宫、宫市等建筑。其中有两处高台建筑基址 据

说是桓公台和金銮殿。内城的南面有官府手工业作坊及其生产者的居住区。外廓面积约 60 平方公里 中部和东北部手工业分布广泛 是城市的经济活动区。区内有各种手工业作坊、公共商业区、居住区和墓葬区等功能分区。手工业作坊包括冶铁、冶铜、制骨等 其中冶铁作坊最多 有的作坊遗址面积达 40 万平方米。居民区内已出现由里坊组成的街区。据考古发现,临淄全城有城门遗址 11 座 其中外廓城门 6 座。城墙全部土筑 墙基 17~43 米 南北城墙外挖有宽 25~30 米、深 3 米的城壕 小城的城墙外也有壕。城墙随地形曲折多变 形制不规则。城内有 10 条干道遗迹 内城 3 条 外廓 7 条 按经纬涂制布局。干道与城门相连 是对应城门之间的通道 宽 8~20 米。城内有排水明渠 大城有一条南北干渠 长 2800 米 宽 30 米 深 3 米 北段有一支渠 内城也有一水渠 这些水渠均注入城外水系。

城市,是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我国城市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 后 经历了 2000 多年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北宋时 由于废除旧的市坊制 商业取得突破性进展 手工业、交通运输、科学技术、城市建筑均有大的发展。宋代以后,城市的经济、文化功能得到强化,城市作为多功能的中心地位得以发展和巩固。到了明清,尤其是清道光二十年(公元 1840 年 鸦片战争后 外国资本的入侵 民族工业的兴起 促使外贸、金融、工商业、航运、建筑业得到较快发展,一部分通商口岸逐步转变为城市。这些工商业城市虽无古代传统的城墙,但它们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区中心。近代城市的发展,使城市出现了水厂、电厂、煤气厂等公用事业,城市道路、交通等市政设施得到相应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城市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局面。1978 年后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城市数量迅速增加 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已迈上新的台阶 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在创建新的、更高层次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

## 第二节 城市建设档案概念的形成

### 一、城市建设档案的产生

“城市建设档案(简称城建档案)一词是 20 世纪 80 年代才被确立的一个概念,但并不等于我国古近代就不存在城建档案。恰恰相反,我国的城建档案源远流长,遗存也较为丰富,它是我国优秀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档案宝藏的重要内容。

城建档案是什么?简单地讲,它是城市建设活动的历史记录。从这个并不严

谨的定义可知，产生城建档案的必备条件应该有两个：一是要有城市建设活动，二是要有用于记录这些活动的文字和载体。

上节已述 我国的城市萌芽于夏代 形成于商周 成熟于春秋战国。西周时曾出现过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建设热潮。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确立，商业和手工业较快发展，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城市文化的兴起，这些因素又促成第二次城市建设热潮的到来。此时，城市规划在前朝的基础上又有创新，由于建筑技能的进步 城墙、城门、宗庙、宫殿、房屋、作坊等建筑 以及道路、排水等设施已达到相当的水平。

城市建设热潮的兴起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在客观上要求把那些日后需要记忆和传承的城市建设活动成果记录下来。在文字出现之前，信息的传递只能靠口传身授。直到夏代文字出现之后，才使得用文字记录城市建设活动成为可能。《史记·封禅书》就曾记载过，一名叫公玉带的济南人献给汉武帝一幅相当于夏代初期的明堂图。图上标有大殿、楼台、围墙、道路等 这显然是一幅相当于现代建筑总平面图的图样。如果我们认可司马迁这段记载的真实性，是不是可以推断我国的城建档案形成于夏代。夏代是我国古代城市的萌芽时期，此时用于记录活动的文字已经出现。从产生城建档案的客观条件分析，明堂图的存在是可能的。1977年在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一块铜制“兆域图”，是我国现存的惟一一件古代建筑平面图，从制图的精确度可以推测，春秋末期，我国的城建档案的绘制已趋成熟。再如春秋末期齐国的工艺官书《考工记·匠人》就是一份总结和反映周代城市建设活动的重要史料。我们现在见到的《考工记》是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将其补入《周礼》中已失传的《冬官》一篇 因此又可称为《周礼·冬官》。至于《考工记》是用什么文字写在何种载体上，后人已无法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从它记载的内容和后代对周代城市的考古发掘相对照，《考工记·匠人》确系春秋末期遗存下来的一部重要城市规划建设规章，它应该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比较完整和系统的一份城建档案。

以上是从文字的出现和城市的形成来说明我国的城建档案可能起源于夏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第二次城市建设热潮的兴起，加之用于记录的金文已经取代甲骨文，记录城市建设活动的城建档案更趋成熟。但是，由于受到记录载体的限制（主要是刻写在青铜器上）当时产生的城建档案也只能是为数极少的“官书”。到了东汉后，由于纸张的出现，人们用于记录的材料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城建档案不论在数量上 还是在形式、内容上也相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二、城建档案概念的形成过程

有了城市 就必然有与之相应的城市建设。因为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功能的发挥，是在建设活动所创建的物质平台上展开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市

建设基本上是一种承前启后、反映当时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水平的创建活动，它要承接历史的优秀文化成果，又很自然地将建设中创建的新的物质成果用某种形式传递下去，为后人了解和传承。城建档案正是在这种历史延续的客观需求中应运而生。

研究城建档案概念的形成，一定要了解我国文书档案演变的一般状况，同时还要了解城建档案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与文书档案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与局部的联系上更好地去认识城建档案。据档案史专家研究认为，档案萌芽于原始社会后期，产生形成于阶级社会初期。也就是说，我国古代以记录公务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档案和档案工作，到了夏代已趋成熟。当时，国家的公务活动主要包括行政、宗教、军事、商业、手工业、建筑等方面的内容。为便于开展公务活动 国家在都城或王城建造了王宫、庙宇、城墙、壕沟、公共建筑、坊市等 城市建设既为公务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又成为公务活动的组成部分。由于古代城市规划和重要的建设工程均属官府行为，记录这些活动的一些公文也就作为公务档案的一部分被保存在官府所设置的档案机构内，也有一些由负责营造工程的官员自行保管。如汉代的石渠阁、兰台、东观就是汉代中央档案典籍库 库内所藏“图籍秘书”多为公务活动产生的档案，其中就有一些地图和建筑图。前面我们提到的《史记·封禅书》说明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在编纂史记时 已经查阅过“石室金匱”里的档案 否则他怎么会知道有幅明堂图呢？正是这幅图和有关记录，使汉武帝得以重建明堂。至于具体的工程施工管理，从汉代出土的骨签档案可知，当时“工官”负责工程管理，并负责保管施工档案。这说明，古代的城建档案从开始形成时起，就是国家公务档案的一部分 与反映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公务档案相比 它的数量很少 因此客观上不可能划分为一个独立的档案门类，同样，在理论上也不可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概念。

到了近现代，由于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逐步扩大，城市建设的项目和内容日渐繁多，城建档案的数量迅速增长，加之档案的载体和形式发生了巨大变革，档案的范围和内容也更加丰富。有的部门或单位，由于档案数量较大，开始设置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其产生的专业档案。如清朝内务府造办处下设的舆图房，既是图样档案的管理机构，同时也是图样档案的专用库房，房内集中保存清政府和前朝遗留下来的地图和工程图纸等图样档案。民国时期，更多的专业部门和单位开始建立本专业科技文件的管理制度和规定，并由经办部门或人员保管所形成的文件材料。如各地管理城市规划建设的工务局，一般在其秘书处下配置专人，有的还设立档案室，负责管理该局形成和积累的文书档案和专业技术档案。

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 从 1953年开始 国家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在改造原有城市的基础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新建工业城市兴建一批大中型工矿企业，以及各地对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改扩建过程中，

产生了大量的城市规划和基本建设方面的技术档案和资料。鉴于技术档案资料大量产生 亟待加强管理的形势 ,1959 年底, 国家档案局在大连召开全国技术档案工作现场会。会议提出“对重要的城市和矿区的基建档案 要进行普查 集中统一管理”。1961 年 1 月, 国务院在转发国家档案局《关于加强城市基本建设档案的意见》中 对基本建设档案是这样定义的:“城市基本建设档案是城市建筑物、构筑物、地上和地下管线等各项基本建设的真实记录 and 实际反映。”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城市建设档案的概念, 它虽不够准确和完整, 但对日后城建档案概念的形成, 产生过重要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 在各地普遍建立城建档案管理机构, 制定和完善城建档案管理规章的基础上, 国家建设主管部门和国家档案局于 1987 年 11 月联合颁发的《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暂行规定》中 将城建档案定义为“城建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及其管理中形成的应当归档保存的文字、图表、声像等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可以看出,《暂行规定》给城建档案所下的定义 已经跳出基本建设档案的范围, 以整个城市为对象, 用城市规划、建设及其管理取代了原定义中的基本建设, 使城建档案在内涵和外延上更准确、更科学。1997 年 12 月 建设部第八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 进一步完善了《暂行规定》提出的概念, 使其成为指导全国城建档案工作健康发展的理论依据。应该指出, 在讨论和定义“城建档案”概念时 各地还提出其他一些版本 但与《暂行规定》提出的定义并无本质差别。当然 随着 21 世纪城市规划理念的不断更新 城市建设重点向“生态城市”的转移 以及城市管理的观念、方法和手段的进一步完善和创新 城建档案的范围和内容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 但它的根本属性和基本概念是不会有有多大改变的。

## 第二章 历代城市建设档案简述

### 第一节 古代城市建设文献和城建档案遗存

#### 一、有关先秦时期的文献与档案遗存

大约在公元前 11 世纪 周武王灭纣 建立了西周。之后 由于实行严格的礼制制度，周王朝的权力更为集中，国力也日显强盛。在成康年代，周朝掀起了以营建王城洛邑（今洛阳）为先导的我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为了指导都邑建设活动，还订立了一套营国制度，洛邑就是在营国制度的指导下建设起来的。史料还记载 西周在建筑技术上已有很大进步 板瓦、筒瓦和脊瓦的出现 解决了屋面防水问题。此时洛邑城内的宫室、宗庙等建筑群已具规模。《考工记·匠人》正是为这次建设高潮而制定的营国制度的一部分，是一份十分珍贵、以规划和建设规章为主要内容的城建档案。

《考工记》系《周礼》的一部分 书中记载了六门工艺 三十个工种的技术规则，其中“攻木之工”部分有“匠人”一节。《考工记·匠人》的内容主要有两个部分：1. 规定“匠人”的职责，一是“建国”即给都城选择位置 测量方位 确定高程；二是营国 即规划都城 设计王宫、明堂、宗庙、道路；三是“为沟洫”即规划井田 设计水利工程、仓库及有关附属建筑。2. 制定规划与建筑规制 即规定都城、王宫及道路规划中的具体技术要求 如都城规划必须“方九里 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 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100 亩”。对明堂、墙、屋舍、仓库等施工工艺 也都作了具体的记述。《考工记·匠人》既是一部官制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规章，又是汇先秦规划与建筑之大成的重要典籍，对后世的城市规划与营造业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先秦时期的建筑档案遗存已十分罕见，前章提到的战国中山王墓一号墓中出土的“兆域图”是现今仅存的一件。该图作于长方形铜板上 主要由线划符号、数字注记、文字说明三部分组成 以示墓域范围、规划布局和建设方位。从图上“中山王律令”可知 当时对建造陵墓的各项尺寸要求极严 同时还规定“其一从 其一藏府”。也就是说 该图一件随葬，一件藏于府库。可见 当时对重要的工程图 已有多套异地保管意识。

此外在《逸周书》、《左传》、《管子》、《老子》、《越绝书》、《齐乘》和《史记》等文献中，均记载有先秦时期城市规划建设内容的片段。尤其是《逸周书·作雒》 可谓是

一本记述营建洛邑的专篇，它对王城的宫室、社稷坛与朝门等建筑，都作了详细的叙述。

## 二、有关秦汉时期的文献与档案遗存

战国末期 由于秦采取残酷的兼并政策 至统一六国时 除秦都咸阳外 大部分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倒退。汉定天下后，汉高祖在其“凡城皆县”的命令下 城市建设有了起色 尤其是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兴建新都长安 后不断扩建 至汉武帝时又大兴土木 经过前后一百多年的建设 长安城成为具有庞大坚固的城垣 整齐宽阔的街道 规模恢弘、交通便利、市肆繁荣的帝都 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三辅黄图》就是一部记载古城长安建设过程和情况的最早、最集中的文献。

据《三辅黄图》记载 当时的长安城墙“高三丈五尺（8.25米），下阔一丈五尺（3.53米），上阔九尺（2.12米），雉高三坂 周围六十五里”经考古工作者实测 长安城墙周长为 25700 米 与文献记述基本相符。在建造长安城墙时 文献留下了从西汉惠帝三年至五年（公元前 191～前 189 年）三次征用民工 31.1 万人次的记录。对于宫殿建筑群的殿阁数量与名称，及其所用建筑材料，更是记叙详尽。

除《三辅黄图》外 记载长安城市建设情况的还可散见于东汉班固的《西都赋》、张衡的《西京赋》及《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

由于城市建设、赋税和战争的需要，地图很可能是最古老的城建档案。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考古学家在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中发现了 7 幅在松木板上的秦始皇八年（公元前 239 年）时的古地图。其中有表示居民点的行政建制的“政区图”，有描绘地形、地貌、河流、道路、关口位置的“地形图”。1973 年 12 月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三幅西汉初年的帛图，其中一幅为城邑图，即我们现在所称的城市平面图。该图绘有城垣的范围、城门堡、城楼、城区街道、宫殿建筑等。据测绘专家分析，这张城邑图很可能是一幅省级首府的平面图，它对研究古代城邑的形制、规划布局、城防设施和城垣、城堡、楼阁建筑艺术等都有很高的价值。由于这幅图是绘在缣帛上的，因而成为我国年代最悠久的仅存的古代帛制城市平面图，实为古代城建档案不可多得的珍品。

## 三、有关隋唐时期的文献与档案遗存

隋唐时期是我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尤其是唐代前期，城市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此时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出现了 15 个人口超过 10 万户以上的城市 其中长安、洛阳两城市的规模尤为宏伟。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 于公元 582 年 在汉长安城东南营建新都大兴城 唐代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继续扩建 前后经历了 72 年（公元 582～654 年）才完成长安的

筑城建设。

公元 605 年 隋炀帝在汉魏洛阳故城西营建东都 同时 又大规模地开凿南北大运河，遂使洛阳成为南北水陆交通的漕运枢纽，经济地位十分重要。

隋唐时的长安和洛阳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两座城市。据文献记载，长安城宏伟壮丽 人口近百万 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商业都会 还是国际交往中心 驻有多国使节和商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整齐、壮观和繁华的城市之一。记载隋唐长安和洛阳两座城市规划建设情况的有《隋书·高祖本纪》、《宇文恺传》、《隋书·炀帝本纪》、附于《隋书》的《明堂议表》、《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唐六典》、北宋《长安志》、南宋《雍录》、元《长安志图》、《资治通鉴·隋记》、清《唐两京城坊考》等 其中尤以《唐两京城坊考》的记载较为集中和具体。

需要指出的是，负责长安和洛阳两个城市的规划和建设的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规划和建筑工程专家宇文恺，他原是将作大匠，后升任工部尚书，主持兴建两座都城及宫殿衙署，以及隋的宗庙、离宫和陵墓等重大工程。他还撰写过一些有关建筑的著作 其中只有《明堂议表》流传后世。根据《明堂议表》可知 宇文恺考证了隋以前的明堂形制，提出建造明堂的设计方案和依据，并且附有按百分之一的比例尺绘制的平面图和模型。当时，重大建筑物在施工前先制图已是通制，而按严格比例制作模型并写出设计依据的说明书则是宇文恺的贡献。

#### 四、有关宋元时期的文献与档案遗存

公元 960 年，宋朝建立，从而结束了唐朝后期至五代十国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两宋时期，在我国城市发展和城市建设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此时，全国 10 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 15 座增至 40 座 由于废除坊市制 商业、手工业十分活跃，城市 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与发展。

由于宋代手工业的发展，建筑材料多样化，建筑技术的精巧，使得建筑构件的标准化在唐代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营造法式》、《木经》、《筑城法式》和《梓人遗制》、《大元仓库记》等建筑文献正是对汉唐以来，尤其是北宋时期建筑设计和施工经验的全面总结和规范，对研究古代城市建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营造法式》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内容最丰富的建筑典籍 由北宋将作少监李诫奉令编修 全书 34 卷 内容包括五个部分：一是“序”、“劄子”和“看详”相当于书的前言；二是“总释”、“总例”两卷 主要是注释各种建筑和构件的名称；三是各作制度十三卷 详细记述了壕寨、石、大木、小木等十三个工种的标准做法 完整地总结了建筑设计和施工中的“模数制”；四是“功限”、“料例”十三卷 规定了各种工程制作和安装的工作量 及使用材料的限量；五是各种工程图样六卷 包括平面、剖面、立面和大样等。

宋元时期 由于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我国城市除北方的开封、大都（北京）外，

南方的临安(杭州)、嘉兴、平江(苏州)、扬州、福州、泉州、广州、静江(桂林)等一批工商业和港口城市迅速崛起,其中北宋时的开封、南宋时的临安、元代的大都是人口达数十万的全国最大的城市,记录这些城市规划和建设情况的可散见于许多历史文献,但主要有:《宋史·地理志》、《宋会要辑稿·方域》、《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清明上河图》、《梦溪笔谈》及《元史·地理志》、《缀耕录》中的《宫阙制度》、《马可波罗游记》等。

此外,宋元时期我国石刻地图档案遗存也较为丰富。除《禹迹图》和《华夷图》等全国性小比例尺地图外,石刻城市地图中以《平江图》和《静江府城池图》最为著名。《平江图》是北宋时平江府(今苏州市)的城市平面图,公元1229年制成,比例尺约为1:3000。图中详细地描绘了城市的各种构成要素:城墙、城厢、平江府、平江军、吴县等军政机关宅院突出于第一层平面,还显示了街坊、寺院、亭台、楼塔以及纵横交错的河网和305座桥梁。在图边上还压缩表示了城郊的著名风景胜地。《平江图》中以道路、水系网络构成的城市平面图内容,与现在苏州老城区的城市布局相比,其基本格局大致相同,一些古建筑,如塔、观、寺等,其位置与现有建筑地点大致相应。石刻平江府图采用平面与三维立体相结合的表现方法,具有很强的立体感和真实感,是一份珍贵的城市平面图档案。

南宋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铭刻在鸚鵡山南面崖壁上的《静江府城池图》长3.2米,宽3.0米。图面除少数部位脱落外,大部分清晰可读。该图从其制作年代、特点、地图内容及附文来看,均与现在的施工平面图相仿,是一幅极其珍贵的静江府城池竣工图。

## 五、明清时期的文献与档案遗存

明朝立国后,由于强化中央集权,推行一系列较为积极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农业生产逐步恢复,手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也得以发展。至明代中叶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一些行业开始萌芽,与此同时,全国出现了50多个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和沿海贸易港口,城市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在建筑技术上,包砌砖垣和新的木构架,广泛用于城墙、宫殿和陵墓建设上。北京的皇史宬,南京的无梁殿等砖券结构的建筑物开始出现,万里长城、北京故宫、十三陵等,成为中国建筑史上一个辉煌时期的标志。

明代遗留至今的文献和档案很少,其中在建筑方面较有影响的专著有《鲁班经》,原书名为《鲁班经匠家镜》,是一本民间匠师的业务用书。全书有图一卷,文三卷。书中介绍行帮的规矩、制度,以致仪式,建造房舍的工序,选择吉日的方法,说明“鲁班真尺”的运用,记录常用家具、农具的基本尺寸和式样,记述常用建筑的构架形式、名称,一些建筑的成组布局形式和名称等。据资料,明代著名建筑工匠蒯祥,一生从事建筑活动达半个世纪之久。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升任工部左侍郎,

由他参加或主持的重大工程有北京宫殿、衙署、隆福寺、紫禁城外的南内、西苑、今北海、中海、南海、殿宇及长陵、献陵和裕陵等。其中由他设计的全套天安门工程图纸，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北京国家图书馆。

此外，《园冶》、《长物志》、《工部厂库须知》等都是记载有关建筑技术的专篇；《大明一统志》、《天工开物》中的《陶埴》款、《天工开物》中的《砖》款、《明史·地理志》等文献中，也有京城规划和建设以及建材工艺方面的记载。

清王朝定都北京后，由于采取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生产的政策，尤其是康乾时期，农业得到发展，经济比较繁荣，工商业城市的数量比明代有所增加。在城市建设方面，清政府对明代宫殿予以保护和利用，并创造了我国古代城市园林和寺庙建筑的鼎盛时期。《工程做法》正是清代在建筑工程逐渐增多，对工程建设亟需统一整顿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部官制建筑设计规范。

《工程做法》共74卷，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刊行。全书内容大体分为各种房屋营造范例和应用工料估算额限两部分。前27卷为27种典型工程实例的大木设计及各部分的详细尺寸，后47卷为大木作、装修作、石作、瓦作、土作、铜作、铁作、搭材作、油作、画作、裱作等13个工种的用料定额规定。大木作各卷还附有屋架侧样（横断面图）示意简图。

《工程做法》既是工匠营造房屋的标准，又是主管部门验收工程、核定经费的明文依据。应用范围主要是营建坊庙、宫殿、仓库、城垣、寺庙、王府等房屋和油画裱糊工程。对于民用修造，与《清会典·工部·营建房屋规则》相辅为用，起着建筑法规监督限制的作用。

此外，清代遗留下来的有关建设方面的文献尚有《工部续增则例》、《内庭做法则例》、《城工事宜》、《圆明园工程做法则例》等。

在清代，工程建设主要由工官负责。工官有“内工”和“外工”之分，他们分属内务府和工部掌管。样式房是工程的设计部门，属内务府，职责是绘制工程图样，制作工程模型（烫样或木模型）和编制丈尺做法说明。内务府营造司销算房和工部营缮司销算房则负责工料的估算和竣工结算等。由于工官负责都城和各地城垣、宫殿、衙署、坊庙、碑亭、道路、河工、造园、陵寝等各项重要工程建设，所形成的工程档案数量很大，故清代工部内设有清档房，专门负责工部档案的管理，在内务府造办处设舆图房，除收藏各种舆图外，还保存一定数量的工程档案。

由于实行严格的工官制，并设有机构负责工程档案管理，清代，尤其是乾隆及其以后的年代，是我国古代保存城建档案最多的时期。至于清代城建档案遗存数量，至今尚无确切的统计。笔者仅从北京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文献目录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4年编纂的《乾隆朝汉文分类检索目录》中做过一次不完全的统计：前者收藏的有关工程建设方面的文献和档案共30项，计168册，其中有都城规划、宫殿、陵寝、城墙（门）、碑楼、道桥等工程和物料价格等方面的内容。后者收藏

的建筑类档案计 1023 卷 包括衙署、府第、官房、行宫、园囿、碑楼、祠坊、考棚、陵寝、坛庙、监狱和建筑材料等 交通邮电类档案计 965 卷 包括道路、桥梁运输、内河水运 驿站、驿道、邮局等。以上两类档案多为修建奏报及动用银两方面的内容 很少涉及竣工事宜，更无工程图的绘制。此外，列入《检索目录》的还有地图类 196 件 真正属于城市平面图和工程平面图的很少 估计不会超出 10%。

另据资料，现今所遗存的最大宗清代建筑工程档案，是清代世袭设计官“样式雷”家族所遗留的数千件图样、上百件烫样和一些《丈尺说明册》等。这些档案除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外 还有一些图件散布在世界 主要是欧美 各地 如著名的圆明园平面图。

“样式雷”是清代宫廷建筑匠师家族。雷氏家族先后有六代人在内廷样式房任掌案职务 负责过北京故宫、三海、圆明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重要工程的设计。雷氏家族在做建筑设计方案时，都按 1:100 或 1:200 比例先制作模型小样呈报内廷，以供审定。这些模型小样均用草纸板热压而成，其中部分建筑物的这种称之为“烫样”的模型 至今仍留存在北京故宫。

## 第二节 近现代城建档案

### 一、近代的城建档案

中国近代史发端于清道光二十年（公元 1840 年）的鸦片战争。由于中国在这次战争中失败 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 因此 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在华割地、租地、开设租界和开辟通商口岸的特权 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列强在中国开辟的通商口岸达 43 个 有 9 个国家先后在上海、天津、广州、厦门、汉口等 10 个城市开辟了租界。1895 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 西方列强更是大举入侵 清政府又在沿海和内地增开口岸 53 个。随着清末洋务运动后一批近代工业的兴起及对外贸易、航运业、金融业的发展，一部分口岸很快发展为近代城市。这些口岸城市在开始兴建时，普遍开展勘察测量，绘制城市平面图，编制城市总体规划。许多城市陆续创办水厂、电灯厂，铺设道路和下水管道，一批近代工业建筑也不断兴起。因而这个时期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形成的城建档案数量较以往有较快增长。

出于保管和利用的需要 晚清政府在实行新政后的一些部门和较大企业 普遍重视对文书档案和科技档案的收集与保管。政府部门实行分科任事制，一般都成立机要科、案牒科等掌管文书档案机构；大型企业则设立文案处或既负责绘图又负责保管图纸的画图房等机构来管理科技文件。由于档案管理机构的加强，使清末时期产生的部分科技档案得以保存下来。在这些科技档案中，城建档案占有一定

的比例。如光绪年间清政府的邮传部存有营口自来水、电灯、电车和筹办蒙古、江西铁路奏折档案,民政部存有修建陵寝、坛庙、衙署、城垣、桥梁、道路、码头、仓库等档案,学部存有修建衙署、文庙工程和修建经科大学、法政科等校舍工程用料、工程做法等档案;宣统年间会议政务处保存的兴建北京自来水和西陵工程等档案。以上这些档案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0世纪80年代各地城建档案馆成立后,也收藏少量本地晚清遗存下来的城建档案。如上海市城建档案馆收藏有1855年印制的上海市平面图和绘制的洋泾浜北岸的现状图,1904年的外白渡桥工程档案和美、英、法、德、日等国租界的地籍图,大连市城建档案馆收藏有1860年拍摄的大连城市旧貌和1909年拍摄的中山广场照片,1898年沙俄占领时期编制的第一部城市规划,1905年绘制的地下管道图等;青岛市城建档案馆收藏有1900年德国占领时期编制的城市规划图和房屋建筑、市政建设等档案。

## 二、民国时期的城建档案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在经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之后,直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全国的经济形势才有所好转,城市建设逐步恢复和发展,1926~1936年间被认为是民国时期国民经济和城市发展的高峰期。据资料,1893年全国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89个,至1936年增至171个,其中10万人以上的城市就有58个,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汉口、香港、沈阳、青岛、大连、杭州等城市的的人口均在50万以上。此时,城市中除修建道路、桥梁、下水管道、电厂、水厂、煤气厂等基础设施外,工业建筑已由传统的木结构、砖木结构转向钢混结构,出现了一些结构先进的工业厂房。各地普遍建造了一批规模大、层次高、具有时代特色的办公楼、学校、医院、商场、银行、火车站等现代公共建筑,也兴建了一批具有西方特色或中西合璧的居住建筑——花园洋房和公寓。城市建设的发展,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档案。现在,各地城建档案馆保存的民国时期的城建档案大多是20世纪30年代留存的。

由于民国时期对公务文书的管理已具现代意识,从中央到各省市政府均建立了相应的档案管理机构,档案管理的法规也较为健全。如民国17年(公元1928年)国民政府颁发《档案室办事细则》,对文书档案管理的职责、办法和手续等均做出明确规定。民国23年(公元1934年)国民政府又颁发《整理国史及档案办法》。民国30年(公元1941年)颁布《各机关保存档案暂行办法》等。这些细则和办法既适用于行政院所属各部委,又对各省市政府其中也包括建设主管部门的档案工作起指导作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院还专设档案整理处,负责档案整理,并指导各部、厅的档案工作。正因为有一套比较完备的档案形成和保管制度,又有专设或兼管的档案机构,因而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主管建设工作的内政部和各省市城市建设的管理部门所形成的大量文书档案得以归档保存,这些档案以后虽多有损

毁，至建国前仍有一部分被保留下来。

保管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档案比较集中的机构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据了解 在民国行政院所属内政部地政、营建、方域各司及建设委员会的档案中 共收藏有关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档案 1600余卷、图纸 137 张 其中有首都分区规划草案 云南、山东等省各项建筑规划 上海房屋建筑规划 济南、天津都市计划大纲 南京、贵州、山西等地自来水厂敷设及概况调查 上海市修建码头、堤岸、桥梁等工程经费支出概算表等。如果把行政院地政署有关建设用地的文件加进去，则涉及城市建设方面的档案数量还要更大。除中央政府各部门所保存的有关城市建设的文件外，各地也保存一定数量的城建档案，如上海市城建档案馆保存的民国时期上海市工务局的档案就多达 30 000 多卷，青岛市保存建国前的城建档案有近 20 000 卷 大连市也藏有近 600 卷。

### 第三节 古近代城建档案特点分析

我国的城市形成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城市发源地之一。如果我们认定《考工记·匠人》就是记录和反映我国周代城市建设高潮中所产生的一部年代最久远的档案，那么我国产生城建档案也有 2500 年的历史了。两千多年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制度及特有的文化背景中形成的我国古近代城建档案，究竟有哪些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特征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 我国古近代尚未形成独立的城建档案工作，城市建设文件多包含在官务文书当中。

城市是一个地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历代王朝为巩固其统治，都十分重视城市建设。为了实施工程管理 我国自商代起 就设有“工官”来管理工奴。周代设有司空职掌营造业 由“匠人”负责都城规划和各项工程建筑。据资料 春秋中期前，由于贵族政权实行世卿制度，有关建筑工程方面的档案，均由相关官员世袭保存。

秦朝设将作少府管理土木工程 其“任内档案”仍自行保管 到了两汉时期 由于重视前朝档案的收集和本朝档案的积累，开始出现石渠阁、兰台等中央档案库，因而汉代朝廷专管土木工程的“工官”——将作大匠在工程建设中形成的档案，除由匠府专管文书档案的官吏保管外，一部分重要工程的奏疏档案，由中央档案库收藏。

隋朝在中央政府设有六部，其中工部主管制定有关建筑工程的法规，实际管理工程的是将作大监。唐朝设将作监，下设四署分管木、土、舟车、石陶等工作。在我国历史上，中央政府设工部这一机构，自隋代始一直延续到清代。根据隋唐时期文书档案工作的规定 工部和其他中央机构一样 设有主管文书档案工作称“都事”的

官吏负责收受、转发文书、稽查缺失、监印等事务。工部及将作监在工程管理中形成的文书，是作为文书档案的一部分入库保存的。宇文恺是隋朝的著名城市规划和设计专家。他历任副监、将作大臣、工部尚书等要职。据《隋书·宇文恺传》宇文恺曾撰有《东都图记》、《释疑》、《明堂图仪》等著作。为作好明堂的规划设计，他博考群籍，对明堂的规格制度，从历史角度逐一考察分析，后上奏《明堂议表》，提出对建造明堂的建议。为显示设计效果，他还绘制了1:100比例尺明堂图，并用木料制作了建筑模型。由上可知，宇文恺在完成各项工程规划和著作中，不仅充分利用自己所保存的工程方面的资料，且查阅了存放在工部和中央档案库的历代工程建设文件。可惜的是，宇文恺的三部著作均已失传，只有《明堂议表》流传后世。

宋元时期，尚书省下设六部，各部分别设有管理文书档案的架阁库，并任命主管官员。此时工部负责工程管理的将作监规模更大，它在工程管理中形成的档案和前朝一样作为文书档案的一部分由工部架阁库收藏。北宋时中央政府设置称为“金耀门”的文书库，规定六部、三司的档案在本衙署架阁库存放一定时期之后，要送交金耀门文书库收存。宋代《营造法式》的编修者李诫，初入将作监时，就是一名管理文书的主簿，后连升三级官晋至监。李诫在将作监任职十三年中，曾掌管许多新建和重建的重要工程，这些工程所形成的文书，有的由他本人保存，有的则存放在工部的架阁库。他在重编《营造法式》时，就是利用了大量自己保存或工部所存的有关档案，花了四年时间，才完成我国建筑史上这部重要法规。

明朝时，六部曾一度直接听命于皇帝，权力很大。此时工部设有司务厅掌管文书工作，工程建设中形成的文件是作为司务厅文书档案的一部分被保存的。到了清代，管理全国的土木工程仍然是工部的主要职责之一，另外内务府设营造司专门管理帝王宫殿和园林建设。由于雍正王朝普遍建立文书档案的副本制度、离任移交和奏折上交等制度，清代，尤其是康乾时期后，工部和内务府的营造司、造办处所形成的工程建设文件与图件，都是作为文书档案的一部分而保存在清档房和档房，并最终向中央档案库——内阁大库移交。20世纪初，清政府在实行“新政”后，有关城市建设方面的档案，在内阁、邮传部、民政部等政府部门的文书档案中，得到较好的分类保管。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主管全国建设工作的是内政部。内政部下设的方域司、营建司和地政司分别负责区划设置，营建规章、计划和各类建筑工程，以及土地和房屋管理等。当时，国民政府各部都设有政务厅，下设负责文书工作的文牍科，并制定比较系统的档案管理制度。1940年国史馆成立后，由于加强对各机关档案的收集与保管，因此大部分有关城市建设方面的文件均在机关文书档案中得到较好保存。各省市也都相应成立主管建设工作的建设厅和工务局。各市工务局总务科或秘书科既是机关文书工作部门，也是文件保管机构，有关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的文件均由它们统一收集和保管。

从上可知 由于我国古代国家政权和地方政府机构设置的历史状况 负责都城和城市建设的机构,均列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执掌城市建设工作中所形成的文件,一般是作为公务文书而被保存在中央档案库内,因此,文书档案与城建档案不分,典籍与档案难分的情况,在古代是非常普遍的。再者,从古近代城建档案发展的水平分析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前 城建档案不可能也没有条件作为一个独立的档案门类收藏和管理。因此,我们在研究古近代城建档案的特征时,要考虑档案工作的整体环境,把城建档案和当时的文书档案管理体制、管理规则联系起来。只有把城建档案作为国家档案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去研究,才能从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上,把握城建档案自身的特征和规律。

2. 古代城建档案遗存较少 且多见于古文献记载 其内容的完整性、适时性和准确性,较之现代城建档案存在较大差异。

由本章第一节可知 两千多年来 我国古代有关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文献数量很少 尤其是城建档案实物遗存 更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 主要有载体、社会和档案形成等三个方面。

我国古代用于记录各项活动的载体经历过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张几个发展阶段。金石取材不便,且刻制困难;简牍体积大,使用和携带不便;缣帛价格昂贵 无法推广普及 汉以后 纸张逐步取代了简牍 成为文字记录的主要材料 但纸张易受潮变霉,难于长久保存。这或许是我国古代档案遗存甚少的重要原因。不可忽略的是在朝代更迭中,档案遭到战乱和人为的毁坏也十分严重。但就城建档案而言,还在于自古以来文书档案是整个国家档案的主体,它记录的内容一般是当时政治、军事、生产活动中的重要事件 而建筑工程在古代被视为工匠手中的粗活,是不受社会重视的行业,偶或有个人手抄秘本,也难以保存和流传,这可能是城建档案遗存少之又少的又一原因。

诚然 历代王朝对都 王 城建设十分倚重,一些重大工程建设均委派官员负责监管,隋以后,中央政府还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宫苑和各地的建设,这就使得一些由官方制定的建筑规章和一些经帝王御批的重大规划和建设项目文书有可能被收集到相关部门(如工部)和中央档案库保存,这些档案日后就成为一些史官编纂史志的文字依据。从前文对历代城市建设文献和城建档案遗存的简介中可知,除《考工记·匠人》、《营造法式》、《工程做法》等少数建筑专著外,一些有关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的记述,大都散存于历代文献中。由于遗址开挖和出土的实物毕竟有限,后人主要还是通过文献中的记述去了解那个朝代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情况。

由于古文献对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记述多系后人所为 严格地讲 它已不是现代意义的“档案”而是在档案基础上经过加工的二次文献 因此文献的完整性、适时性和准确性均受到历史的局限。但是,由于原档案已无从查找考证,古文献中的记述就成为研究当时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珍贵参考资料。如记述唐代长安和洛阳的建

设情况的《唐两京城坊考》其作者是清人徐松。为了考证 1200 年前唐代两座京城的规划和建设 使《城坊考》尽量与历史状况相符 他从 1809 年开始 用了整整 40 年的时间 搜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 终于在去世前完成了全书的编纂。《城坊考》共五卷 记述了长安、洛阳两京城的城坊、宫殿、衙署、街市、苑囿以及渠道分布等。他还根据掌握的资料 绘制了多幅平面示意图。现在，《城坊考》已经成为我们了解和研究长安与洛阳两座城市变迁、发展的珍贵史料。

《唐两京城坊考》和其他一些古文献一样 系后人根据历史上的有关档案资料，经过整理考证所编纂。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对唐长安城遗址的多次发掘 证明《城坊考》的记述与发掘的遗址基本相符。但是，由于撰稿人生活的年代距隋唐兴建长安城的时间相隔太久，且受资料所限，因而书中某些记载过于简单甚至也有明显的丢失和谬误。尽管如此，古文献中对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记述，是一种难得的历史补缺，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它的历史价值。只是我们在研究和利用这些史料时，要有辩证的历史的观点 不能全盘肯定 也不能全盘否定 而要结合考古发掘 认真做好对占有资料的比较考证工作，从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充分挖掘古文献中所蕴含的档案价值，为我们研究城市建设及其发展服务。